

分类号 C8/273
UDC _____

密级 公开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研究——基于 CFPS2018

研究生姓名: 杜文豪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杨盛菁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统计学、应用统计硕士

研究方向: 经济与社会统计

提交日期: 2021年6月6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导师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导师(校外)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意”/“不同意”) 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导师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导师(校外)签名： 杨盛青 签字日期： 2021年6月6日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Based on CFPS2018

Candidate : Du Wenhao

Supervisor: Yang Shengjing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入学总量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上升。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2019年达到了50%以上,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我国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有效的满足了国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使得更多国民有机会、有能力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但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并不意味着人人享有。国民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依然存在竞争,竞争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数量竞争表现为有多少国民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质量竞争表现在国民获得高等教育层次的高低。在数量竞争上,我国依旧存在弱势群体,而在质量竞争上,这一不平衡现象则更加严重。

弱势群体和不平衡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从国民个体因素角度上进行剖析,个体因素主要反映在个体在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因素可以用家庭资本这一概念进行概括。因此,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必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资本的影响。本文以 Bourdie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结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微观角度上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分析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不平衡现象的原因。具体的,文章以家庭资本理论作为基础,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选取变量,采用 Logit 模型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三项内容:1.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数量竞争方面)。2.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质量竞争方面)。3.研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对于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家庭资本所产生的影响依旧显著,并且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所产生的影响越大。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三种维度的家庭资本均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时该效应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 家庭资本; 高等教育机会; Logit 模型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total enrollment and gross enroll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increased rapidly. The gross enrollment rat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reached 48.1% in 2018 and more than 50% in 2019,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peopl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There is still competition in th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mainly in the form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quantity competition shows how many citizens can get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quality competition shows the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quantity competition, there are still vulnerable groups in China, while in quality competition, the imbalance is more seriou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imbalances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national factors. Individual national factor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in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and these factors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concept of family capital. Therefore, individual citizens must be largely affected by family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Based on Bourdieu's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combined with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im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s reason.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uses family capital theory as a basis, draws on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selects variabl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uses the Logit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Specificall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ontents: 1.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competition). 2.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erms of quality competition). 3. To study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amily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or obtaining different levels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is still significant,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and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Keywords: family capital;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Logit regression model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文献综述	5
1.2.1 以家庭资本为视角的相关研究	5
1.2.2 以社会分层为视角的相关研究	7
1.2.3 分析方法	9
1.3 研究框架	10
1.3.1 研究目标	10
1.3.2 研究方法	11
1.3.3 文章结构	11
2 相关概念及实证分析方法	12
2.1 相关概念	12
2.1.1 高等教育	12
2.1.2 家庭资本	12
2.1.3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13
2.2 实证分析方法	14
2.2.1 Logit 模型	14
2.2.2 多项 Logit 模型	15
3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实证研究	16
3.1 数据来源	16
3.2 变量选取	16
3.3 数据整理与清洗	18
3.4 描述统计分析	19
3.4.1 因变量的描述统计	19
3.4.2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20

3.4.3 家庭文化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21
3.4.4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22
3.4.5 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23
3.5 单变量差异分析	23
3.5.1 不同居住地类型下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23
3.5.2 不同户籍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24
3.5.3 个体性别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24
3.6 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 Logit 模型分析	25
3.6.1 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25
3.6.2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层次的影响	29
3.6.3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32
4 结论与启示	37
4.1 结论	37
4.2 启示和建议	38
4.3 研究的不足	39
4.4 展望	39
参考文献	41
后 记	4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接受教育作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当今社会条件下国民实现个人发展的主要方式,直接关系到国民在社会中对知识、生存技能、物质财富甚至是社会地位的获取能力。因此,接受教育对国民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高等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是个体正式进入社会前培养和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当今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个体实现自身发展至关重要。高等教育主要是指在个体在完成中等教育(多指中学)的基础上,参加选拔考试后获得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人才和专业人才的主要社会活动。在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是指适龄青少年在完成中学教育后,通过参加高考或其他方式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习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公民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加重要,高等教育公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是社会公平和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而高等教育在最初是专门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产物,仅供少数精英阶层的公民享用,是社会阶层和特权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后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高级化的专业人才的需求增长,才使得高等教育逐渐迈向大众化发展道路。从高等教育发展史可见,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附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为大众化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西方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起步时间较早,最初是专门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从西方高等教育起源一直到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高等教育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一直都是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专享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高等教育开设的本质目的是帮助西方国家中的社会精英阶层巩固社会地位,获取政治权利和维持物质财富而存在的。高等教育仅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服务这一垄断优势通过培养人才加固了他们的阶层地位和优势。直到二战后,教育民主化思潮的冲击使得高等教育逐渐开

始大众化，推动着高等教育向着大众化阶段迈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普及程度大大提升，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都可以不同程度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极大的促进了西方国家公民素质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为西方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人才，这为后来西方国家社会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起步时间晚，从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才正式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综合国力相对薄弱，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计划经济的特征。其本质目的是为服务于特定的国家建设领域而挑选、培养专门化的人才。同时，户籍、区域等诸多因素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国内形势并未给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滞缓。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形势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我国开始注重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转向正轨。后续，我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大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以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较为典型的政策是《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一系列相关政策有效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相对薄弱，高等教育发展较为滞后，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国民仍是小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推行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逐渐落实，高等院校建设的完善和扩招政策陆续制定。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提升，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国民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高等教育这一稀缺资源可更完善的服务于国民。在改革开放至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 15%，按照国际惯例可认为这段时期属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精英化时期。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15%，按照国际案例，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由精英化迈入大众化发展阶段。2002 年至 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继续上升，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深度进一步加强，并逐渐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过渡，可更加充足有效的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48.1%，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的历史关口。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继续上涨，按照国际案例，51.6% 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表明我国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

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推进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和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 等目标。十四五规划纲要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会进一步强化，可更有效的、高质量的满足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综上，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进步，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民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正式迈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国民可以容易、经济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但是国民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仍然会存在竞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主要分为数量竞争和质量竞争两种形式。数量竞争重点表现在有多少国民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是一个“量”的概念，而质量竞争就表现在国民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层次的高低，是一个“质”的概念。在当前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国民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逐渐由数量竞争转变为质量竞争。而无论是数量竞争还是质量竞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社会必然会对个体进行一定的筛选。同时，需要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主要社会群体是青少年，家庭是青少年习惯、性格、价值观等重要因素形成和自身成长的最初环境。因此，家庭状况必然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资本是家庭状况的重要反映，家庭资本作为个体家庭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文化惯习等内容直接体现，必然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重要影响。

那么，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家庭资本对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及程度，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该种影响是否具有差异，不同维度的家庭资本所具有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家庭资本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是否具有异质性问题颇具有研究价值，有利于揭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所具有的影响，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的发展和进步。基于上述问题，文章认为家庭资本是影响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体在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家庭资本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异质性。

1.1.2 研究意义

学术界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多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主要是以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作为理论依据进行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诸多研究结论表明,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对个体获得教育机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但多数研究是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展开的,通过一定的标准把个体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分析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影响因素复杂化的背景下,以社会阶层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做法固然合理和可行,但社会阶层视角过于宏观,在研究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往往不够细致。同时,社会分层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层次家庭之间巨大的家庭资本差异,是家庭资本决定了家庭处于何种社会阶层。同时,高等教育的主要需求群体主要是依附于家庭生活的青少年,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这一过程中,家庭资本必然产生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家庭资本角度来分析不仅可以有效的验证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可以细致的研究不同维度的家庭资本的影响的分异。因此,本文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将家庭资本按照相关理论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可有效、充足的反映和概括家庭资本状况。接着结合 CFPS2018 数据选取合适的变量,分别考察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的影响。同时,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关注于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户籍差异、性别差异及城乡差异等,对于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异质性关注度并不高。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鉴于学术界相关研究很少关注于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本文在分析影响效应的同时,也将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异质性。

本文对于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发展与进步可能具有一些意义。我国高等教育在 2019 年正式迈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可更加充实、有效的满足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国民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竞争,在数量竞争方面依旧存在弱势群体较为困难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在质量竞争方面,这一不平衡现象则更加严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仍需优化,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其高等教育基础建设水平相对较低,个体家庭资本水平有限,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竞争和质量竞争方面均居于劣势地位。因此,不同地区、

不同户籍类型和居住地类型个体的家庭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研究不同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有利于了解到家庭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可有效分析出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的弱势社会群体。同时,分析家庭资本对不同地区的个体产生影响的异质性可为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1.2 文献综述

1.2.1 以家庭资本为视角的相关研究

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属于教育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该问题的由来可追溯于 Bourdieu (1991) [1][2]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时所构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Bourdieu 对于该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并未做出严格的界定,而是主张结合具体领域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 Bourdieu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重新对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依据理论将家庭资本分解为若干个重要维度。Bourdieu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教育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将资本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若干个维度这一点为后续学者研究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学术界对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展开了大量研究,充分论证了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各个维度的家庭资本所具有的影响有所差别。因而,可将学术界相关研究按照家庭资本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总结和归纳。

家庭经济资本是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始终都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3],经济资本是最直接作用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学术界相关研究都不同程度的证实了家庭经济资本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直接引致了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如 Robert H. Haveman (2006) ^[4] 经过分析得出,家庭经济资本差异导致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明显差异,而差异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继续存在。张秀娟和胡建国 (2014) ^[5] 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加强了家庭经济资本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的影响效应。薛海平 (2017) ^[6] 对 2014

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时发现,个体进入优质中学的比例与家庭的经济能力成正比,经济能力优越家庭的个体进入高质量中学的比例明显大于经济能力一般和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同时应该注意到个体就读中学的质量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对个体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产生影响,一是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二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持续性。对于前者,Coleman(1996)^[7]发现家庭经济资本一方面对学生选择就读高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家庭经济资本对其自身期望和信心也产生了影响;对于后者,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对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得他们在衡量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收益时更加谨慎,甚至是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如潘懋元(2016)^[8]指出在当今社会培养一名大学生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对于经济能力弱势家庭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基于上述研究的分析结论认为,家庭经济资本是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

家庭文化资本是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内在驱动。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定义,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具体内容具有差别,但大致都依照 Bourdieu 的理论。Bourdieu(1986)^[9]认为文化资本是在教育行为中传递的文化资产、知识和技能等等,通过教育资质证书“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主要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个体的“性情”,即个体自身的修养。第二种是“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本,主要指受社会认可的学历证书、技能证书等资历证明。第三种是与文化相关的有形资产,即数据、书画等有形的物质的文化资产。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携带着其所在阶层的文化资本在获得高等教育时处于优势地位,解释了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的影响。由于反映个体性情的变量较难获得,本文研究的家庭文化资本仅指后两种形式。诸多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文化资本通过氛围、价值追求、习惯等方式驱动个体去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Bourdieu(1986)^[9]发现在控制个体的家庭经济和社会资本条件后,家庭文化资本丰厚的个体获得教育成果的几率更大,本质原因在于家庭文化资本可转化为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刘志民和高耀(2011)^[10]基于江苏省高校的调研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优势可以间接的转化为教育机会优势。张意忠(2016)^[11]经过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不仅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个体是否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还对个体学业表现具有影响，还会影响个体对就读高校专业的选择，如 Dustman（2004）^[12]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就读高校类型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家庭文化资本优越和家庭文化资本一般的个体倾向就读的高校类型具有很大差别，前者更加倾向就读于学术型大学，后者就读于职业学院的概率更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家庭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家庭内部传承和外部优势转化两种路径使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获得优势。

家庭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外部推力。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难以直接衡量和测量。因此相关研究多从社会分层角度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在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社会资本丰厚的个体能够获得其带来的外部助力进而在获得高等教育时处于有利地位。如 Bourdieu（1986）^[6]在著作中提到社会资本以人为载体，是通过社交关系网络产生价值的资源，处于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社会资本在教育中进行代际传递，因社会阶层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象首先就表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Coleman（1990）^[13]认为丰厚的家庭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更好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同时，这一点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下并未得到改善。如杨东平（2006）^[14]发现在在高等教育扩招后，优势阶层的个体更多的集中在优势专业和品质好的大学。钟云华和沈红（2009）^[15]经过分析指出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正在向优势阶层进行倾斜。王香丽（2011）^[16]的研究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下，家庭社会资本优越的个体与家庭社会资本一般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越来越大。基于上述结论，家庭社会资本是以家庭成员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外部推力作用。

1.2.2 以社会分层为视角的相关研究

Sandy Baum 和 kathleen payea（2004）^[17]基于美国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公民获得的高等教育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家庭的经济地位对个体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家庭经济能力不仅对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具有显著影响（高经济收入家庭的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明显优于低经济收入家庭的个体），同时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品质具有影响（高经济收入家庭个体更多

的就读于品质较高的四年制私立大学，而低经济收入家庭个体更多的就读于两年制公立大学）。同时，他们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家庭子代与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具有紧密联系，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呈现出强正相关性，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比较大，而父母未接受高等教育家庭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较小。并且在美国不同品质的大学，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程度也具有明显差异，品质较高的四年制私立大学学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通常较高，而品质较低的两年制公立大学学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通常较低。

李春玲（2003）^{[18][19][20][21][22]}从社会分层角度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对不同社会阶层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并未因高等教育的扩招而缩小，城市家庭和乡村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变得更大，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更加不平等。李春玲的研究表明父亲的职业、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能力等因素对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社会阶层差异带来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现象在高品质高等教育上更加明显。同时，李春玲也关注了城乡的高等教育差异和性别差异等问题。在城乡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而该种现象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阶层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的，经济能力有限与个人判断选择形成了农村地区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碍。在性别差异上，李春玲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能力等因素对女孩产生的影响明显大于男孩。

谢作栩和王伟宜（2004）^{[23][24][25][26]}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分析视角上，主要在社会阶层和家庭文化等角度分析各类型高校学生的入学差异，分析居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个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十分明显。具有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优势的高社会阶层家庭个体往往能够获得我国重点院校的高等教育机会，而家庭经济能力低下家庭个体很难进入学费高昂的民办高等院校学习。在民族上，谢作栩经实证发现，在家庭资本条件不变情况下，少数民族能更容易地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学科差异上，经过分析得出高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多就读于热门专业或就读成本较高专业，而低社会阶层家庭个体则

更多的就读于基础类专业或就读成本较低的专业。

1.2.3 分析方法

相比国外的研究而言,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起步时间较晚。但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定量研究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质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社会阶层为主要视角的整体性研究和以家庭资本为主要视角的分解性研究。两种类型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家庭资本的认定与考虑。以社会阶层为视角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是以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作为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家庭资本的丰厚程度与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以家庭所属社会阶层作为家庭资本的有效表征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个体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如谢作栩和王伟宜(2004)^[24]基于五省份部分高校入学学生的调研数据研究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个体在是否获得高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品级上差异明显。王伟宜(2013)^[27]基于我国16所高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个体占据着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刘志民和高耀(2011)^[28]对江苏省14所高校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依旧明显。蔡文伯和伍开文(2014)^[29]基于新疆8所高校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所处社会阶层对个体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具有显著影响。

以家庭资本为视角的分解性研究的视角相对细致,通常依据相关理论将家庭资本划分为若干个维度,研究不同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家庭资本的划分,多数研究将家庭资本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如蒋国河和闫广芬(2006)^[30]基于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研究城乡个体的学业成就差异,又如张翔和赵必华(2012)^[31]探究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学业成就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将家庭资本划分成四个维度,如郑雅萍(2017)^[32]将家庭资本分解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研究四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经过统计,学术界相关研究更多依照相关理论将家庭资本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贺晓珍(2019)^[33]的研究表明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均对个体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影响,且三个维度的家庭资

本相互作用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差距的形成和加剧。吴鹏（2019）^[34]研究了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家庭资本对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文将重点借鉴分解性研究的研究视角，将家庭资本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分析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上，相关研究在对数据的基本分布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模型多采用 Logit 模型研究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产生的影响。如李德显和陆海霞（2015）^[35]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 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对家庭资本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周昊昊等（2019）^[36]采用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影响。吴鹏（2019）^[34]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综上可见，利用 Logit 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是一种学术界相对经典的做法。采用 Logit 模型的主要原因在于 Logit 模型可有效分析出各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对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和地区异质性进行实证，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1.3 研究框架

1.3.1 研究目标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的影响，具体的可分为三个子目标。

1. 分析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是否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及分异。
2. 分析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分异。
3. 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

育机会影响的异质性。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在知网上查找国内外关于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文献，通过阅读和归纳相关文献的主要研究成果，筛选出对本研究有借鉴价值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对筛选出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为本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在前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了解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扩展方向，确定文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并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2. 实证研究法。结合相关理论和学术界相关研究分析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对 2018 年的 CFPS 数据进行清洗和描述性统计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利用 Stata 统计软件，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和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探究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3. 比较分析法。对比实证研究结果，分析三个维度家庭资本的影响及在不同地区该影响的分异，研究影响的异质性。

1.3.3 文章结构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通过交代文章的研究背景，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接着，在总结和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以找到本文的研究思路。文章研究背景通过交代高等教育的定义与发展历程，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出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是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一方面总结和概括出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文献的分类和总结，寻找本文合适的视角和思路。同时，明确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和逻辑顺序。

第二章是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简介。首先结合相关理论和学术界相关研究介绍家庭资本的定义，明确研究主体，并对使用的数据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进行简要介绍。接着，介绍本文的实证模型方法，即二元 Logit 模型和多

项 Logit 模型的原理、公式和适用的问题。

第三章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部分包含实证分析的全过程。首先是准备工作，主要包含介绍数据来源、选取的变量和数据清洗三项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进行实证并根据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第四章是结论与建议。基于前文分析，将模型分析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根据结论，提出建议。最后，结合文章的写作过程进行总结，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2 相关概念及实证分析方法

2.1 相关概念

2.1.1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进行的专业指向性和职业指向性的教育活动，是培养专业化、高级人才的主要社会活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主要包含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两大部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招收对象的不同，同时在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上也有很大区别。一般认为，普通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具有主体地位，成人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本文研究的高等教育指的是普通高等教育，不涉及成人高等教育，因此不再阐述成人高等教育的相关内容。在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以完成中学教育的毕业生为招收对象，以全日制作为主要培养方式进行专业或职业教育。提供教育的机构主要是公办和民办的专科或本科院校。我国高等教育依照学历的高低主要可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同时研究生又包含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因此可大致按照学历高低将高等教育分为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四个层次。综上，本文研究的高等教育指的是进行社会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层次指的是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2.1.2 家庭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家庭资本存在于家庭这一特定场域之中。在本研究中，家庭资本指的是源自于家庭的具有价值的物化财产和隐性资产，即有助于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一过程中形成优势的家庭资源。根据 Bourdieu 的家庭资本理论和借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本文将家庭资本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下面将针对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结合本文研究需要进行阐述和定义。

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显性的物质化资本，即能转化为金钱的财富。经济资本可通过私人产权或直接兑换的方式转化为金钱或者货币。在当今社会中，经济资本多表现为个人拥有的金钱、房产、汽车等可用于消费的显性资本。在本研究中，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家庭经济资本指的是家庭资本中的物资财产，主要以经济收入、物质财产、家庭消费为主要表征。

家庭文化资本是家庭资本中与文化相关的家庭资源。家庭文化资本体现的是家庭氛围、修养等综合素质和涉及到个人文化素养、认知等多种因素。如何有效的对家庭文化资产进行衡量相对较为复杂，根据 Bourdieu 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可大致将家庭文化资本划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个体“性情”，即个体所带有的文化修养、性情和家庭氛围等因素。第二种是“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本，主要指受到社会认可的资历证明，如学历证书、技能证书等等。第三种是显性的文化相关的有形资产，即书画、文物等物质化的文化资产。本文通过借鉴相关研究，将以家庭氛围、“制度化”文化资产和显性文化资产三个方面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状况。

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资本中依赖于社交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具有价值的隐性资本或资源。Bourdieu 认为社会资本的产生依赖于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所附有的资本大小，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在固定的场域中长期形成的产物。本文将家庭社会资本定义为以家庭为圆心的社会关系资源，可用家庭成员数量、职业、社会地位等内容进行有效反映。本文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维度主要通过利用父亲职业反映家庭社会地位，利用家庭成员数量反映家庭积攒社会关系的能力，利用家庭人情支出额来反映家庭社会关系的联系程度，以此三方面来反映家庭社会资本状况。

2.1.3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开展的一项全国性社会调查。该社会调查涉及内容多，调查规模大，可有效反映中国家庭生活的多个方面。该调查通过对被调查人或家庭进行信息收集和追踪，可有效的记录并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基本状况和变动情况。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覆盖我国多个省市，调查规模为 16000 户家庭，因而该调查具有地理覆盖范围广、调查规模大、数据量可观等优点。鉴于此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从 2010 年开始在中国各省份的家庭开展追踪调查并公开发布调查数据结果。2010 年后每隔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目前发布了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 的主要原因如下：（1）数据质量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设计权威，针对数据调查开展了大量工作，经过相当长的周期进行完善和优化，数据质量高。（2）数据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充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分为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儿童问卷，问卷种类多，覆盖全面，可满足数据筛选和变量选取。（3）契合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考察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CFPS 数据可以很好的满足本文的数据要求。

2.2 实证分析方法

Logit 模型是常用于针对离散性分类变量进行建模，是分析或预测离散型因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2.2.1 Logit 模型

Logit 模型的原理主要参考了王济川和郭志刚（2001）^[37]、Cox.D.R（1970）^[38]、尹建杰（2011）^[39]的研究。二元 Logit 模型的假设是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假设自变量 X_T 与因变量 Y^* 的线性关系可用公式（2.1）表达。

$$Y^* = \alpha + \beta X_T + \varepsilon_k \quad (2.1)$$

设置临界点 i ，当 Y^* 值大于 i 时，则 $Y = 1$ ；当 Y^* 小于 i 时，则 $Y = 0$

则 $Y=1$ 的概率为:

$$P(Y = 1|X_T) = P[(\alpha + \beta X_T + \varepsilon_k) > 0] \quad (2.2)$$

式 (2.2) 可进一步简化:

$$P(Y = 1|X_T) = F(\alpha + \beta X_T) \quad (2.3)$$

则 $F(*)$ 为误差项 ε_k 的累积分布函数, 若 ε_k 服从于 Logistics 分布, 则由上述公式就得到了 Logit 模型。于是得到的 Logit 模型为:

$$P(Y = 1|X_T) = \frac{\exp(\alpha + \beta X_T)}{1 + \exp(\alpha + \beta X_T)} \quad (2.4)$$

式 (2.4) 经过对数变换后, 就转变为:

$$\ln\left(\frac{p_k}{1-p_k}\right) = \alpha + \beta X_T \quad (2.5)$$

式 (2.5) 中, p_k 为第 k 个案发生对应事件的概率。当自变量增加为多个时, 可在式 (2.4) 上进行扩展得到多个自变量的 Logit 回归模型。

$$p_k = P(Y_k = 1|x_{1k}, x_{2k}, x_{3k}, \dots, x_{mk}) \quad (2.6)$$

$$p_k = \frac{\exp(\alpha + \sum_{m=1}^M \beta_m X_{mk})}{1 + \exp(\alpha + \sum_{m=1}^M \beta_m X_{mk})} \quad (2.7)$$

其中, k 为个案数量, M 为自变量的个数。

2.2.2 多项 Logit 模型

此部分主要参考了陈强 (2013) [40] 的著作。多项 Logit 模型是在二元 Logit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推广。多项 Logit 模型适用于个体具有多个选择的情形。假设在某个事件中, 共有 J 个方案可供选择。则个体 i 选择方案 j 的原因在于方案 j 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由此, 可设定个体 i 选择方案 j 的效用为:

$$U_{ij} = \beta_j X_i^T + \varepsilon_{ij} \quad (i = 1, \dots, n, j = 1, \dots, J) \quad (2.8)$$

当 $j=1$ 时, 个体 i 选择方案 j 的概率可写为:

$$P(y_i = 1|x_i) = \frac{1}{1 + \sum_{k=2}^J \exp(X_i^T \beta_k)} \quad (2.9)$$

当 $j=2, \dots, J$ 时, 个体 i 选择方案 j 的概率可写为:

$$P(y_i = j|x_i) = \frac{\exp(X_i^T \beta_j)}{1 + \sum_{k=2}^J \exp(X_i^T \beta_k)} \quad (2.10)$$

其中, 当 $j=1$ 时所对应的选择方案为多项 Logit 模型中的对照方案。

3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免费公开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18），下载网址为（<http://isss.pku.edu.cn/cfps/download/login>）。

3.2 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的影响。在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 CFPS2018 数据进行变量选取，现将选取的变量介绍如下：

1.因变量。第一，基于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需要，将家庭成员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情况为因变量。具体的以家庭成员中子女完成的最高学历是否达到了大专及以上作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体划分如下：子女完成的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的视为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子女完成的最高学历达到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视为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第二，基于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需要，将家庭成员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为因变量，划分为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四个层次。

2.控制变量。为了更清晰的研究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本文将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外的一些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纳入变量体系以控制和减少误差，提升模型效果。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的制度，本文将性别、家庭居住地类型、户籍类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变量体系。第一，可更有效的探析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第二，控制变量可有效的反映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城乡、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使得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视角更加全面。

3.自变量。基于文章的研究目的，选取的自变量主要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

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出发。结合 CFPS2018 数据选取合适变量，具体变量如下：

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化私有制的物质财产。本文以家庭自有资产水平、家庭经济收入能力、家庭消费能力三个方面反映家庭经济资本状况。具体的，以家庭房产当前市值、现金及存款数额反映家庭自有资产水平；以年工资收入额、年家庭全部纯收入额、年人均家庭纯收入反映家庭经济收入能力；以年耐用品消费总值、年文教娱乐支出额、年居民消费性支出反映家庭消费能力。

家庭文化资本是家庭中文化相关具有价值的资源。本文主要以“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本、显性家庭文化资本以及家庭氛围三方面反映家庭文化资本状况。具体的，以父亲最高学历、母亲最高学历、家庭总阅读量反映家庭“制度化”文化资产状况；以家庭藏书量反映家庭显性文化资产水平；以家庭和睦自评值反映家庭氛围的和谐程度。其中，将父母完成的最高学历分为七级，第一级为文盲/半文盲学历，第二级为小学学历，第三级为初中学历，第四级为高中学历，第五级为大专学历，第六级为本科学历，第七级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在本文使用的数据集中，没有家庭的父母最高学历达到博士研究生。

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蕴含在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家庭社会资本的衡量相对复杂，本文用父亲职业层级反映家庭社会地位，以家庭人情总支出额反映家庭社会关系的联系程度，以家庭成员数量反映家庭所能积攒社会关系的能力。其中父亲职业层级划分为四级，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成员为第一级；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服务业、商业人员为第二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为第三级；国家机关、组织、事业单位、企业负责人为第四级。

综上，选取变量的介绍及赋值标准见表 3.1。

表 3.1 选取变量及赋值

变量	维度	变量名称	标记	含义及赋值标准
因变量		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Y	子女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赋值为 1, 否则为 0
		家庭居住地类型	X ₁	城市赋值为 1, 乡村赋值为 0
	控制变量	户口类型	X ₂	非农业户口赋值为 1, 农业户口赋值为 0
		子女性别	X ₃	男赋值为 1, 女赋值为 0
		家庭房产当前市值	X ₄	单位: 万元
		年耐用品消费总值	X ₅	单位: 万元
		现金及存款数额	X ₆	单位: 万元
	家庭经济资本	年文教娱乐支出额	X ₇	单位: 万元
		年居民消费性支出	X ₈	单位: 万元
		年工资收入额	X ₉	单位: 万元
		年家庭全部纯收入额	X ₁₀	单位: 万元
自变量		年人均家庭纯收入	X ₁₁	单位: 万元
		父亲最高学历	X ₁₂	级别一至七依次赋值为 0 至 6
		母亲最高学历	X ₁₃	级别一至七依次赋值为 0 至 6
	家庭文化资本	家庭藏书量	X ₁₄	单位: 本
		家庭和睦自评值	X ₁₅	自主评定, 按等级分为赋值为 0 至 4
		家庭总阅读量	X ₁₆	单位: 本
		年家庭人情总支出额	X ₁₇	单位: 万元
	家庭社会资本	父亲职业层级	X ₁₈	级别一至级别四依次赋值为 0 至 3
		家庭成员数量	X ₁₉	单位: 人

3.3 数据整理与清洗

CFPS 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调查并发布, 其调查过程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广受学术界好评。但发布的原始数据并不适宜直接用来进行统计分析。在实际使用中, 需要根据研究需要结合数据结构进行整合和清洗。原始数据集中存在一定的异常数据和无效数据, 若对数据集中的异常数据不采取有效的方式进行处理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模型结果, 造成偏误。本文根据

选取的变量，结合原始数据集情况，进行的数据调整和清洗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1) 数据整理。利用家庭编码和个人编码，将家庭经济问卷、家庭成员问卷和个人自答问卷进行整合，为满足实证建模对数据进行整合。

(2) 清除无效的数据记录。在 CFPS 调查数据集的部分变量中，存在无效记录，如父母最高学历、房产当前市值等变量中存在“不知道”、“不适用”等记录，考虑到 CFPS 数据量客观，直接剔除了上述无效记录。

(3) 清除极端数据和异常数据。CFPS 数据集部分变量中存在一定量的极端值，其原因可能是被调查人面对一些可能的敏感性问题的，如家庭收入、家庭支出等方面问题，回答不配合所造成的。需要对这一部分极端、异常数据（如家庭全部收入额过低，如 0.1 万元）进行清除，以提升模型质量。

(4) 清除自相矛盾的数据。在 CFPS 数据中，部分数据记录在各变量反映出的信息存在矛盾的现象，如家庭居住于一线城市市区的非农业户口家庭，其房产市值却低于 5 万元；或者，家庭藏书量与家庭阅读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数据记录，通过清除这些自相矛盾的数据记录以提升模型质量。

经过调整和清洗，最终确定的数据量为 5009 条，数据量、质量均可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3.4 描述统计分析

3.4.1 因变量的描述统计

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和清洗后，数据量为 5009，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所占比例为 25.77%。

个体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数量为 3718 个。其中，个体完成的最高教育学历为文盲/半文盲的为 261 个，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为小学的家庭数量达到了 718 个，个体完成最高学历为初中的家庭数量达到了 1604 个，个体完成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家庭数量达到了 1135 个。

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家庭为 1291 个。其中，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为大专的家庭数量达到了 647 个，个体完成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家庭数量达到了 573

个，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家庭数量为 65 个，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的家庭数量为 6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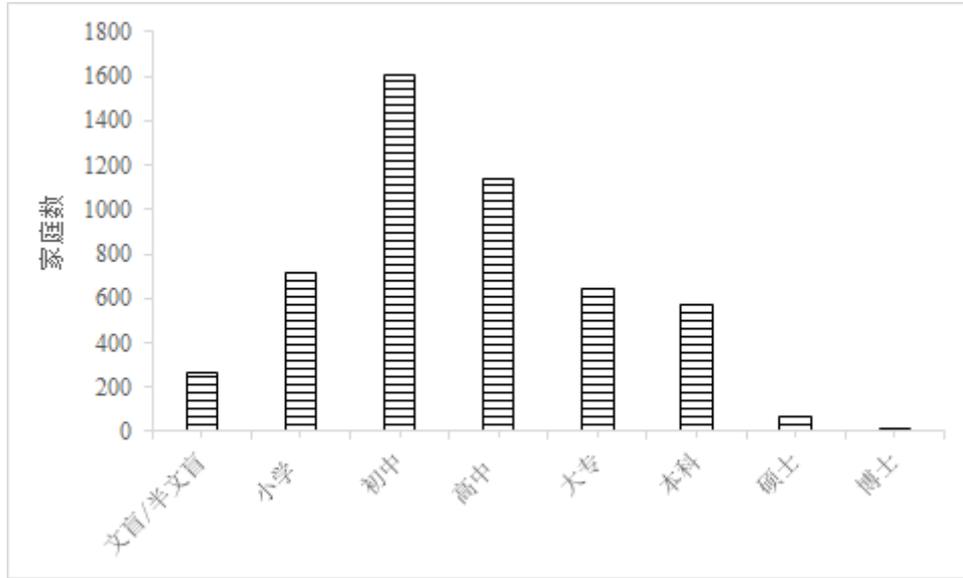


图 3.1 个体获得教育层次的家庭数量分布

图 3.1 横轴为个体获得的教育层次，纵轴为家庭数量。由此可知，个体获得教育层次的家庭数量分布大致服从轻微右偏的正态分布。其中，个体获得初中学历的家庭最多，个体获得高中、小学、大专、本科学历的家庭相对较多，个体为文盲/半文盲及获得博士学历的家庭数量最少。结合实际情况，样本的分布状况良好，与实际结合程度较高。

3.4.2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中的变量均为连续性数据，采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2。

表 3.2 家庭经济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单位：万元

变量名称	变量标记	个案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房产当前市值	X ₄	5009	5	1200	48.90	83.46
年耐用品消费总值	X ₅	5009	0	100	5.33	8.92
现金及存款数额	X ₆	5009	0	400	5.97	14.33
年文教娱乐支出额	X ₇	5009	0	24.05	0.68	1.14
年居民消费性支出	X ₈	5009	0.3	92.38	7.15	6.79
年工资收入额	X ₉	5009	0.01	66.5	6.50	5.65
年家庭全部纯收入额	X ₁₀	5009	0.18	266.1	9.71	9.73
年人均家庭纯收入	X ₁₁	5009	0.04	80	2.33	2.58

由表 3.2 可知，在本文使用的数据集中，家庭房产当前市值 X₄ 均值为 48.9 万元，现金及存款数额 X₆ 均值为 5.97 万元，X₄ 和 X₆ 反映了家庭经济资本中家庭自有资产状况。同时，X₄ 和 X₆ 这两个变量标准差在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中最大。根据这一信息可判定出整体上家庭经济资本的自有资产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家庭资本中以年工资收入额、年家庭全部纯收入额、年人均家庭纯收入反映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和以年耐用品消费总值、年文教娱乐支出额、年居民消费性支出反映家庭消费能力所表现的标准差推测家庭经济收入获取能力和家庭消费能力的差异相对较小，但具体变量的差异有所分异。其中，标准差较小的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是年娱乐文教支出额，其次是年人均家庭纯收入，说明二者的整体差异较小。同时，根据各个变量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可以看出，家庭经济资本的各个变量的极差都非常大，说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家庭经济资本状况，差距十分明显。

3.4.3 家庭文化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家庭文化资本维度中所包含的变量为父母的学历、家庭藏书量、家庭和睦自评和家庭总阅读量，其中父母学历、家庭和睦自评值为有序的离散型变量，而家庭藏书量和家庭总阅读量为连续型的数值变量。其中，父亲获得最高学历的分布状况为：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的家庭数量为 1179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小学的家庭数量为 1348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初中的家庭数量为

1617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家庭数量为 653 个，父亲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数量一共有 4797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大专的家庭数量为 135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本科的家庭数量为 68 个，父亲完成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家庭数量为 9 个，父亲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数量为 212 个。父亲获得最高学历的分布大致服从右偏的正态分布。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的家庭数量有 2242 个，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小学的家庭数量为 1135 个，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初中的家庭数量为 1086 个，母亲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家庭数量为 425 个，母亲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数量为 4888 个；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大专的家庭数量为 93 个，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本科的家庭数量 27 个，母亲完成最高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家庭数量为 1 个，母亲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数量为 121。父母完成最高学历的分布主要反映出父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家庭比例很小，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差异明显，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大众化发展的成果。同时，普遍现象是母亲完成的教育层次比父亲完成的教育层次要低。

家庭藏书量极大值为 1000，极小值为 0，均值为 33.27，标准差为 71.10；家庭总阅读量极大值为 600，极小值为 0，均值为 12.78，标准差为 30.17。家庭和睦自评值是根据调查人面对问题是否觉得自己家庭和睦幸福而给出有序的五个选项（极不和睦赋值为 0，家庭不和睦赋值为 1，家庭比较和睦赋值为 2，家庭和睦赋值为 3，家庭非常和睦赋值为 4）其中，78.6%的家庭认为家庭非常和睦，15.6%的家庭认为家庭比较和睦，5%的家庭认为家庭和睦，0.5%的家庭认为家庭不和睦，0.3%的家庭认为家庭极不和睦。近 80%的家庭认为家庭非常和睦，对家庭的氛围十分满意。

3.4.4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家庭社会资本维度中包含家庭年人情总支出额、工作类型等级、家庭成员数量三个变量。其中，家庭年人情总支出额极小值为 0 万元，极大值为 16 万元，均值为 0.53 万元，标准差为 0.75，极差说明在家庭年人情总支出额上，家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家庭成员数量极小值为 1，极大值为 21，均值为 4.13，标准差

为 2.01。同时，本文将按照职业将父亲的工作类型分为了四个层级，第一级占比 3.2%，第二级占比 49.3%，第三级占比 32.4%，第四级占比 15.1%。其中，第二级职业层次占比最大，近 50%，说明父亲为职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服务业、商业人员的最多，父亲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成员的最少。

3.4.5 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本文选取的变量中有三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居住地类型（城市或者乡村）、户籍类型（农业或者非农业）及性别（男或女）。其中，居住地为乡村的家庭数量为 2625 个，居住地为城市的家庭数量为 2384 个，大致达到了 1:1。家庭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家庭数量为 3638 个，家庭户籍类型为非农业户口的家庭数量 1371 个，农业户口的家庭所占比例较大。个体性别为女的家庭数量为 1690 个，个体性别为男的家庭数量为 3319 个，个体性别为男孩的家庭数量明显大于个体性别为女孩的家庭数量。

3.5 单变量差异分析

3.5.1 不同居住地类型下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通过建立因变量（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与家庭居住地类型（城市或者乡村）的交叉表，分析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居住地是否具有明显差异，见表 3.3。

表 3.3 居住地类型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家庭数量的交叉表

居住地类型	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总计	显著性	似然比
	获得	未获得			
乡村	437	2188	2625	0.00	242.61
城市	854	1530	2384		
总计	1291	3718	5009		

由表 3.3 可知，不同居住地的家庭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明显差异。居住在城市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35.82%，而居住在乡村的家

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16.65%，两种居住地类型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差异巨大，前者大约是后者的 2.15 倍。同时，显著性和似然比说明了不同居住地类型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家庭居住地类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是正确的。

3.5.2 不同户籍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通过建立因变量（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与家庭户籍类型（农业或非农业）的交叉表，分析不同户籍的家庭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是否具有明显差异，见表 3.4。

表 3.4 不同户籍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交叉表

户籍类型	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总计	显著性	似然比
	获得	未获得			
农业	668	2970	3638	0.00	358.38
非农业	623	748	1371		
总计	1291	3718	5009		

由表 3.4 可知，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显著差异。非农业户籍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45.44%，农业户籍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18.36%，两种户籍类型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差异巨大，前者大约是后者的 2.47 倍。显著性和似然比说明不同户籍类型的家庭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是显著的。因此将户籍类型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是正确的。

3.5.3 个体性别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通过建立因变量（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男或女）的交叉表，探究性别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异，见表 3.5。

表 3.5 性别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交叉表

性别	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总计	显著性	似然比
	获得	未获得			
女	565	1125	1690	0.00	76.34
男	726	2593	3319		
总计	1291	3718	5009		

不同性别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显著差异。由表 3.5 可知，女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33.43%，男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率为 21.87%，性别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差异，显著性和似然比说明了该差异较为显著，因此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是正确的。

3.6 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 Logit 模型分析

3.6.1 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1) Logit 模型建立

依照上文中所构建的变量体系，选用二元 Logit 模型，利用 Stata 软件建立了因变量 Y（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对控制变量和三种类型的家庭资本变量的 Logit 回归模型。分别使用普通标准误和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使用两种标准误所建立的模型系数和标准误非常接近，大致可说明模型不存在错误设置和异方差等问题。为了方便表述，在此将使用普通标准误建立的 Logit 模型命名为 Logit 模型 1，将使用稳健标准误建立的 Logit 模型命名为 Logit 模型 2，具体可见表 3.6。

表 3.6 Logit 模型

变量	Logit 模型 1		Logit 模型 2			Logit 模型 3	
	系数 Coef	普通标准误	系数 Coef	稳健标准误	几率比	稳健标准误	几率比
X ₁	0.401***	0.082	0.401***	0.081	1.493	0.120	1.489***
X ₂	0.434***	0.088	0.434***	0.088	1.543	0.136	1.544***
X ₃	-0.339***	0.074	-0.339***	0.075	0.712	0.053	0.711***
X ₄	0.001*	0.001	0.001*	0.001	1.001	0.001	1.001**
X ₅	-0.002	0.005	-0.002	0.005	0.998	—	—
X ₆	0.002	0.003	0.002	0.003	1.002	—	—
X ₇	-0.034	0.037	-0.034	0.04	0.966	—	—
X ₈	-0.022**	0.007	-0.022***	0.007	0.978	0.006	0.975***
X ₉	0.023**	0.010	0.023**	0.009	1.023	0.009	1.019**
X ₁₀	0.023**	0.010	0.023***	0.008	1.024	0.006	1.033***
X ₁₁	0.038	0.028	0.038	0.027	1.039	—	—
X ₁₂	0.281***	0.037	0.281***	0.038	1.325	0.050	1.321***
X ₁₃	0.364***	0.037	0.364***	0.038	1.439	0.054	1.443***
X ₁₄	0.002**	0.001	0.002**	0.0006	1.002	0.0004	1.002***
X ₁₅	-0.019	0.060	-0.019	0.061	0.981	—	—
X ₁₆	0.001	0.002	0.001	0.001	1.0004	—	—
X ₁₇	-0.012	0.045	-0.012	0.047	0.988	—	—
X ₁₈	-0.039	0.049	-0.039	0.049	0.962	—	—
X ₁₉	-0.08***	0.020	-0.08***	0.02	0.923	0.018	0.922***
Cons	-2.016***	0.315	-2.016***	0.324		0.015	***
R ²		0.159		0.159			0.158
LR		907.74		667			667
Prob		0.000		0.000			0.000

注：***指对应的变量在 0.01 水平上显著，**指对应的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指对应的变量在 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 3.6 可知，使用普通标准误或稳健标准误所估计的 Logit 回归模型在标准误差上均无明显差异，因此模型的设定形式是较为准确的。在以稳健标准误估计的 Logit 模型 2 中，显著的变量共 11 个，其中 X₁、X₂、X₃、X₈、X₁₀、X₁₂、X₁₃、X₁₉ 在 0.01 水平下显著，X₉、X₁₄ 在 0.05 水平下显著，X₄ 在 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控制变量和家庭资本变量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同时，Logit 模型 2 中的部分变量不显著，无法说明这些变量显著的影响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因此，将显著性较差的变量从 Logit 模型 2 中进行剔除，采用稳健标

准误，得到了 Logit 模型 3。此时，Logit 模型 3 中所包含的变量除了 X_4 在 0.05 水平下显著，其余变量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对比 Logit 模型 2 和 Logit 模型 3 的稳健标准误和几率比均不存在较大的区别和差异，两个模型在家庭资本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解释性相差不大。LR、 R^2 和 P 值进一步说明 Logit 模型 3 显著性很高且拟合效果较好。出于简便原则，为更加清晰的解释各变量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的影响，以 Logit 模型 3 的几率比进行解释。

首先，为了减少统计误差和更加清晰的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所具有的影响。本文将家庭居住地类型、户籍类型、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变量体系。结果表明家庭居住地类型、户籍类型、性别均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由 Logit 模型 3 的各变量几率比可知， X_1 （家庭居住地类型）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城市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是乡村家庭个体的 1.489 倍，即城市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比乡村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多出 48.9%。 X_2 （户籍类型）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非农业户籍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农业户籍的个体高出 54.4%。 X_3 （性别）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由三个控制变量的几率比可知，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不同户籍、居住地类型、性别均具有较大的影响。控制变量中，户籍类型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居住地类型，最后是性别。根据这一信息可得出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乡村的农业户口家庭中的男孩。

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中显著的变量是 X_4 （房产当前市值）、 X_8 （年居民消费性支出）、 X_9 （年工资收入）、 X_{10} （年家庭全部纯收入），其中 X_4 反映了家庭经济资本的自有资产状况， X_8 反映了家庭消费能力， X_9 和 X_{10} 反映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由表 3.6 可知， X_4 （家庭的房产市值）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房产市值越贵的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更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家庭房产市值每高出 10 万元，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就会增加 1%。 X_8 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同等条件下，年家庭消费性支出每增加 1 万元，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就会减少 2.5%。 X_9 、 X_{10} 对个体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同等条件下，年工资收入每增加一万元，则提升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 1.9%，年家庭全部纯收入每增加一万元，则会提升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 3.3%，年家庭全部纯收入的影响略大于年工资收入。综上，可认为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影响效应较大的是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中的经济收入水平，自有资产状况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家庭消费能力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负向影响。

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文化资本维度中显著的变量为 X_{12} （父亲最高学历）、 X_{13} （母亲最高学历）、 X_{14} （家庭藏书量）， X_{12} 、 X_{13} 主要反映了家庭文化资产中来自父母影响的“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本，而 X_{14} 主要反映了家庭文化资产中的显性资产水平。由表 3.6 可知， X_{12} 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的最高学历每上升一个层次，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则会提升 32.1%。 X_{13} 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显著正向性影响更大，母亲的最高学历每上升一个层次，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提升 44.3%。由此认为家庭文化资本维度中，父母学历等“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产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 X_{14} 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家庭藏书量每增加一本，则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增加 0.2%。而反映家庭氛围的 X_{15} （家庭和睦自评值）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文化资产中家庭氛围无法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显著影响。

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但呈现为较小的负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维度中， X_{17} （年人情支出总额）、 X_{18} （父亲工作层级）均不显著，仅 X_{19} （家庭成员个数）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影响是负向的。其中， X_{17} 反映了家庭社会关系的联系程度， X_{18} 反映了家庭的社会地位，二者均不显著，说明无法证实年人情支出总额和父亲工作层次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影响。 X_{19} 的几率比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家庭成员数量每增加一个，使得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几率比减少 7.8%。因此可认为在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中，仅反映家庭积攒社会关系能力的 X_{19} 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效应是负向的。即家庭成员的增多，非但不能有效的帮助家庭积攒隐藏在社会关系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反而会使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分散和削弱，减少个体在家庭中享有的经济、文化资本

水平，使得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处于劣势地位。

同时通过 Logit 模型 3 的整体分类效果来推测 Logit 模型 3 的解释能力和模型效果，Logit 模型 3 对于数据集的预测情况见表 3.7。

表 3.7 Logit 模型 3 的预测效果

Logit 模型 3 分类结果	真实情况		
	获得	未获得	共计
获得	396	226	622
未获得	895	3492	4387
共计	1291	3718	5009

由表 3.7 可知, Logit 模型 3 预测分类的准确率为: $(396+3492)/5009=77.62\%$, 说明 Logit 模型 3 的拟合和精准分类性能优良, 模型效果良好。鉴于本文的主要是探究家庭资本对子女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精准预测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故在此不过多阐述关于模型精准分类的相关内容。

3.6.2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层次的影响

在本节, 主要采用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探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影响。依照研究的内容和逻辑, 将对因变量进行重新设定, 根据个体完成的最高学历, 将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认定为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赋值为 0, 作为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中的对照组。将大专认定为获得第一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 赋值为 1。将本科认定为获得第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 赋值为 2。由于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家庭数量较少, 因此将二者进行合并, 将硕士、博士统一认定为获得第三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 赋值为 3。利用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对变量体系中所有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 X_5 (家庭年耐用消费品支出总额)、 X_6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 X_7 (家庭年文教娱乐支出总额)、 X_{11}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 X_{15} (家庭和睦自评值)、 X_{16} (家庭总阅读量)、 X_{17} (家庭年人情支出总额)、 X_{18} (父亲工作层级) 等变量的显著性在三个层次中效果较差。综合考虑后, 将这些变量进行剔除。从而, 由重新设定的因变量对 X_1 、 X_2 、 X_3 、 X_4 、 X_8 、 X_9 、 X_{10} 、 X_{12} 、 X_{13} 、 X_{14} 、 X_{19} (与 Logit 模型 3 的变量相

一致) 进行多项 Logit 回归, LR 为 991.78, P 值为 0.000, R^2 为 0.1247, 模型效果良好, 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符合 IIA 假定, 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3.8。

表 3.8 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多项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层次一		层次二		层次三	
	几率比	标准误	几率比	标准误	几率比	标准误
X ₁	1.448***	0.148	1.523***	0.176	1.782*	0.600
X ₂	1.392***	0.154	1.725***	0.205	1.526*	0.499
X ₃	0.751***	0.069	0.676***	0.067	0.571**	0.145
X ₄	1.001*	0.001	1.001*	0.001	1.000	0.001
X ₈	0.976***	0.007	0.976***	0.008	0.948**	0.023
X ₉	1.026**	0.012	1.014	0.011	1.019	0.019
X ₁₀	1.024***	0.009	1.040***	0.008	1.057***	0.010
X ₁₂	1.215***	0.055	1.440***	0.070	1.551***	0.186
X ₁₃	1.433***	0.065	1.414***	0.068	1.860***	0.226
X ₁₄	1.001**	0.001	1.002***	0.001	0.998	0.002
X ₁₉	0.969	0.023	0.869***	0.025	0.791***	0.071
Cons	0.063***	0.010	0.051***	0.009	0.005***	0.002

注: ***指对应的变量在 0.01 水平上显著, **指对应的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 *指对应的变量在 0.1 水平。

由表 3.8 可知, 各变量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 Logit 回归模型的几率比具有一定差异。其中, 层次三中的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所包含的数据量相对较少所造成的, 不过前文已经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些变量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显著影响, 因此为了清晰的展示各层次似然比的变化, 暂时忽略掉层次三中部分变量显著性的变化。

高等教育层次越高, 家庭居住地、户籍类型、性别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由表 3.8 可知, 控制变量 X₁ (家庭居住地)、X₂ (户籍类型)、X₃ (性别) 在高等教育层次变化上表现出的影响有加剧的趋势。其中, X₁ 的几率比逐层增长, X₂ 波动增长, X₃ 逐层下降, 表明家庭居住地、户籍、性别不仅显著的影响了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 该影响依旧显著, 且高等教育的层次越高, 这种影响就越大。其中, 高等教育层次越

高,居住地为城市的家庭个体比居住地为农村的家庭个体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更加具有优势。高等教育层次越高,非农业户口家庭个体比农业户口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越大。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女孩比男孩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更大。

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但影响效应有所分异,主要起作用的是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家庭经济资本在三个层级中均显著的是 X_8 (居民消费性支出) 和 X_{10} (家庭全部纯收入) 分别反映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经济收入水平。 X_8 的几率比在三个层级中的变化较小,层级一至层级二未发生变化 (0.976), 在层级三中有所降低 (0.948), 说明家庭经济资本中反映家庭消费能力的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加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起到了负向作用, 并且对于获取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 这种负向效应会增加。 X_{10} 的几率比在三个层次中均出现上涨, 说明家庭资本中反映家庭收入水平的年家庭纯收入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并且对于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这种效应进一步扩大。对比 X_8 和 X_{10} 的几率比变化, X_{10} 的影响明显大于 X_8 , 由此可认为家庭经济资本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经济收入能力。 X_4 (房产当前市值)、 X_9 (年工资收入) 的几率比变化较小且显著性降低, 因此认为这两个变量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具备明显的趋势。整体上, 家庭经济资本对于个体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消费能力主要起到了抑制作用, 而经济收入能力则能够帮助个体更好的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

高等教育层次越高, 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中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在三个层次中均显著的 X_{12} (父亲最高学历)、 X_{13} (母亲最高学历), 其中 X_{12} 的几率比在三个层次中递增, 说明父亲最高学历对个体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影响更大。 X_{13} 的几率比呈现波动增长, 增长幅度明显, 说明母亲最高学历对个体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影响更大。二者综合说明了家庭文化资本中“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产对个体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效应更大。 X_{14} (家庭藏书量) 几率比变化幅度较小, 显著性降低。因此可认为 X_{14} 对个体获得三种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效应较为稳定。

在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中, 不能证实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社会资本中 X_{17} （家庭年人情支出总额）、 X_{18} （父亲工作层级）显著性均较差，无法有效说明家庭社会资本中家庭社会地位与家庭社会关系的联系对个体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具有重要影响。而反映家庭积累社会关系能力的 X_{19} （家庭成员个数）几率比呈现递减（即使在层次一的 Logit 模型中显著性较低，但在层次二和层次三中较为显著），说明 X_{19} 对个体获取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前文中发现家庭成员个数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这一趋势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继续保持，且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升高，负向效应愈加明显。即家庭成员过多非但不能有效的帮助家庭积累社会关系使得个体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反而可能会使得家庭经济、文化资本进行分散，从而妨碍到个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3.6.3 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本节通过将数据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子样本，重点探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地区异质性。经过清洗，样本中的数据一共涉及了中国 28 个省市，不含中国台湾、西藏、宁夏等地区的数据。通常认为经济发达的省市通常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本文主要以各地区的经济实力将 28 个省市划分为三组，分别为经济发达组、经济发展组和经济滞后组。其中，经济发达组包含 9 个省市，经济发展组包含 9 个省市，经济滞后组包含 10 个省市。为了简单直观，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判定标准以 2018 年各省市人均 GDP 的高低作为标准进行划分，具体划分结果见表 3.9。

表 3.9 省市划分表

省市	2018 年人均 GDP	类型	数据量
北京	153095		
上海	148744		
江苏	115930		
浙江	101813		
福建	98542	经济发达组	共 1298 条数据
广东	88781		
天津	85757		
湖北	71109		
重庆	69901		
山东	66472		
陕西	62195		
安徽	54078		
辽宁省	53872		
湖南	52809	经济发展组	共 2051 条数据
海南	52801		
河南	52114		
新疆	51950		
四川	51556		
江西	49013		
青海	45739		
云南	43366		
河北	43108		
山西	43010	经济滞后组	共 1660 条数据
贵州	42767		
吉林	41516		
广西	40012		
黑龙江	33977		
甘肃	30797		

依据表 3.9 的划分结果对数据集进行拆分,利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以 Logit 模型 3 中所包含的自变量对个体是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3.10。

表 3.10 各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滞后组		经济发展组		经济发达组	
	几率比	稳健标准误	几率比	稳健标准误	几率比	稳健标准误
X ₁	1.1632	0.1827	1.4326***	0.176	1.8599***	0.3072
X ₂	1.9745***	0.3416	1.3747**	0.192	1.3154*	0.203
X ₃	0.8183	0.1176	0.7853**	0.091	0.5222***	0.074
X ₄	0.9996	0.0012	1.0011	0.0009	1.0004	0.0005
X ₈	0.9925	0.0108	0.9642***	0.012	0.9621***	0.009
X ₉	1.0315*	0.0183	0.9829	0.0168	1.0397**	0.016
X ₁₀	1.0355***	0.0102	1.0266***	0.0104	1.0398***	0.0118
X ₁₂	1.4306***	0.0967	1.3541***	0.0835	1.1897**	0.0828
X ₁₃	1.3694***	0.0967	1.4775***	0.0891	1.518***	0.1056
X ₁₄	1.0016	0.00108	1.0018***	0.0006	1.002***	0.0007
X ₁₉	0.9279**	0.0322	0.9143***	0.0286	0.9288**	0.0343
Cons	0.0829***	0.0178	0.1471***	0.0294	0.1457***	0.0377

注：***指对应的变量在 0.01 水平上显著，**指对应的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指对应的变量在 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 3.10 可知，在各组变量的显著性和几率比显示出各组地区之间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经济滞后组中显著的变量为 6 个，分别为 X₂（户口类型）、X₉（家庭年工资收入）、X₁₀（年家庭全部纯收入）、X₁₂（父亲最高学历）、X₁₃（母亲最高学历）、X₁₉（家庭成员数量），其中对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程度较大的是 X₂、X₁₂、X₁₃。经济发展组中显著的变量为 9 个，分别为 X₁（家庭居住地类型）、X₂（户籍类型）、X₃（子女性别）、X₈（年居民消费性支出）、X₁₀（年家庭全部纯收入）、X₁₂（父亲最高学历）、X₁₃（母亲最高学历）、X₁₄（家庭藏书量）、X₁₉（家庭成员数量），其中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程度较大的有 X₁、X₂、X₃、X₁₂、X₁₃。经济发达组中显著的变量为 10 个，分别为 X₁（家庭居住地类型）、X₂（户籍类型）、X₃（性别）、X₈（年居民消费性支出）、X₉（家庭年工资收入）、X₁₀（年家庭全部纯收入）、X₁₂（父亲最高学历）、X₁₃（母亲最高学历）、X₁₄（家庭藏书量）、X₁₉（家庭成员数量），其中对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程度较大的

有 X_1 （家庭居住地类型）、 X_2 （户籍类型）、 X_3 （性别）、 X_{12} （父亲最高学历）、 X_{13} （母亲最高学历）。由三组的显著变量个数变动情况来看，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资本更加全面的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影响，影响因素更加全面，但具体效应会有所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在经济滞后组，仅反映家庭经济资本中经济收入能力的 X_9 、 X_{10} 较为显著。在经济发展组，则反映家庭经济资本中家庭消费能力的 X_8 和反应经济收入能力的 X_9 显著。在经济发达组，则 X_8 、 X_9 、 X_{10} 均显著。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经济资本更全面的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家庭经济收入能力起到了主要的促进作用，家庭消费能力起到了次要的抑制作用。

在各个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济滞后组，反映制度化家庭文化资产的 X_{12} （父亲最高学历）、 X_{13} （母亲最高学历）显著。在经济发展组和经济发达组， X_{12} 、 X_{13} 和反映家庭显性文化资产的 X_{14} （家庭藏书量）。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文化资本更全面的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产起主要作用，显性文化资产作用较小。同时，从反映制度化家庭文化资产的 X_{12} 、 X_{13} 的几率比变化上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父亲完成的最高学历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小，而母亲完成的最高学历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在各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较为稳定。结合上文，无法验证家庭社会资本中反映家庭社会地位的 X_{18} （父亲工作层级）和反映家庭社会关系联系程度的 X_{17} （家庭年人情支出总额）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影响。但以 X_{19} 所反映的家庭社会关系积累能力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资本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均呈现为负向影响，这说明了在各个地区，家庭成员数量都不能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提供助力，反而会造成家庭经济、文化资本的分散与削弱，进而使得个体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处于劣势。

从各组变量的几率比变化来看， X_1 （家庭居住地类型）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X_2 （户籍类型）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小。 X_3 （性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X_8 （居民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家庭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X_{12} （父亲最高学历）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小。 X_{13} （母亲最高学历）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从各组的变量显著性来看， X_2 （户籍类型）、 X_{10} （年家庭全部纯收入）、 X_{12} （父亲最高学历）、 X_{13} （母亲最高学历）、 X_{19} （家庭成员数）始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影响。有效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三种维度的家庭资本均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基于 Bourdieu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和借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将家庭资本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并结合 CFPS2018 数据选取合适的变量并采用 Logit 模型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照学历高低对高等教育进行层次划分，研究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最后，通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数据集进行划分，探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先将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 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户籍家庭中的男孩是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弱势群体。文章通过设定家庭居住地类型、户籍、性别三个控制变量以减少统计误差，模型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类型、户籍、性别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居住在城市的家庭个体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比居住在乡村的家庭个体更有优势，非农业户籍家庭个体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比农业户籍家庭个体更有优势，女孩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比男孩更有优势。由此可判定，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户籍家庭中的男孩。

(2) 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中的经济收入水平，而家庭经济资本维度中的自有资产状况具有的影响相对较小，家庭消费能力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负向影响。第二，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产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较大的影响，而显性家庭文化资产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较小。第三，无法有效验证家庭社会资本中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非但不能有效的帮助家庭积攒隐藏在社会关系中的家庭社会资本，反而会造成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散和削弱，使个体享有的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水

平下降，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时处于劣势地位。

(3) 对于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第一，高等教育的层次越高，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越大，但该影响有所分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能力起到小规模的抑制作用。第二，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特别是“制度化”的家庭文化资本。第三，不能有效验证家庭社会资本在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中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4) 在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三个维度的家庭资本均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产生的影响越大，但影响效应具有分异。第二，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较为稳定。同时，家庭居住地类型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户籍类型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小。性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的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大。

4.2 启示和建议

根据研究所得的主要结论，现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提出如下可能性的建议。

(1) 扶持乡村地区农业户籍家庭，使乡村家庭子女能够更加公平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我国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下，国民被划分为市民和农民两种类型。在此制度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随之产生了二元制结构。乡村地区农业户籍家庭子女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明显处于弱势，乡村地区农业户籍家庭子女获取高等教育的数量和层次都落后于城市地区非农业户籍家庭子女。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二元制的教育差异愈发明显。不仅是优秀的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城市，乡村地区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与城市地区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差距过大，而且乡村地区子女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时就已经处于弱势。因此，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扶持乡村地区教育发展，改善乡村地区农业户

籍家庭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状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扶持滞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促进了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对经济发展具有激励作用，二者相互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滞后省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其造成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造成的各地区巨大的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而教育经费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直接动力，教育经费的差距直接决定了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因此，扶持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主要路径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4.3 研究的不足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研究家庭资本对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现将文章写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文章研究的不足之处总结于下：

(1) 专业概念的界定与解释可能不够准确。由于家庭资本的概念脱胎于 Bourdieu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后续也有大量教育学学者对家庭资本进行解读、研究，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家庭资本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和界定，但难免会有偏差。作者将通过后续学习进一步完善相关知识。

(2) 变量体系的构建覆盖度不够完善。文章基于家庭资本的概念，尽可能覆盖到全方面去构建变量，但限于作者知识体系有限，且必须选用与 CFPS 数据结合度较好的变量。因此，构建的变量体系覆盖完善度，即是三种家庭资本的各个方面不够完善。

(3) 文章写作技巧问题。在论文写作中，作者尽可能的去做到文章表述清晰、结构完整，但限于作者水平有限，在写作论文中，可能仍然会存在一些词汇和语句表述不够清晰，意思模糊，语句矛盾等现象。作者在后续将会对论文进行反复修改，尽量改掉上述错误。

4.4 展望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课题，作者将通过进一步的学

习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以便能够更好的去分析、研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参考文献

- [1]P.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
- [2]P.Bourdieu and J.D.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 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 [3]谭敏.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分化的教育社会学分析——家庭资本的视角[J].山东高等教育,2016,4(06):73-79.
- [4]Robert H. Haveman,Timothy M. Smeedi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 n Social Mobility[J]. The Future of Children,2006,16(2).
- [5]张秀娟,胡建国.扩招背景下家庭对教育平等影响的演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06):114-121.
- [6]薛海平.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17(02):31-41 +48.
- [7]Coleman James S..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reexamined[J]. Colem an James S.,1969,2(2-4).
- [8]潘懋元,左崇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反思[J].攀登,2016,35(02):138-14 4.
- [9]P.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 ciology education.[M] 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86.
- [10]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 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12):18-27.
- [11]张意忠.城乡家庭资本差异对子女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6, 37(08):22-25.
- [12]Christian Dustmann. Parental Background, Secondary School Track Choice, and Wage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4,56(2).
- [13] Coleman James 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Cambridge: MA.,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 [14]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0 1):19-25.

- [15]钟云华,沈红.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9,7(05):56-61.
- [16]王香丽.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特点和路径选择[J].现代教育管理,2011(06):33-35.
- [17]Sandy Baum, Kathleen Payea. Education Pays 2004: The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Individual and Society[R]. College Board,2004.
- [18]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 [19]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2010,25(03):82-113+244.
- [20]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29(02):65-89+243.
- [21]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04):66-77+205.
- [22]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09(01):14-18.
- [23]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02):65-74+96.
- [24]谢作栩,王伟宜.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从科类、专业角度谈起[J].大学教育科学,2005(04):58-62+66.
- [25]谢作栩,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探讨——陕、闽、浙、沪部分高校调查[J].东南学术,2004(S1):259-264.
- [26]王伟宜,谢作栩.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J].江苏高教,2005(04):21-24.
- [27]王伟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12):35-44.
- [28]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12):18-27.
- [29]蔡文伯,伍开文.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新疆的实证研

- 究[J].教育科学,2014,30(04):55-61.
- [30]蒋国河,闫广芬.家庭资本与城乡学业成就差异——基于实证调查基础上的相关分析[J].青年研究,2006(06):28-34.
- [31]张翔,赵必华.家庭资本对学生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现状与趋势[J].教育学术月刊,2012(03):84-87.
- [32]郑雅萍.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研究[J].东南学术,2017(05):220-225.
- [33]贺晓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家庭资本影响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9(04):34-40.
- [34]吴鹏. 家庭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D].南京邮电大学,2019.
- [35]李德显,陆海霞.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的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5,44(04):50-60.
- [36]周昊昊,张棉好,陈奇琪.家庭资本对高等职业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J].职教通讯,2019(01):32-39.
- [37]王济川,郭志刚.Logistic 回归模型-方法与运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38]Cox, D. R. The Analysis of Binary Data[J]. London: Methuen. 1970.
- [39]尹建杰.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综述及应用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1.
- [40]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后 记

时光荏苒，硕士学习阶段很快就要画上句号了。在兰州的这三年，我收获良多，得到了老师们悉心的教导，得到了同学们无私的帮助，在这一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成长。

感谢杨盛菁老师和韩君老师对我的照顾和教导，二位老师的监督和教导对我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感谢我们的学习小团队成员们对我的帮助，在学习和生活中，帮助我解决难题和烦恼，我们一起讨论、学习和进步的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感谢我的室友们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的鼓励。当然，也要感谢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给予我的帮助。

在兰州度过的这三年学习时光，使我学会了怎么学习，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和发展方向。感谢兰财，感恩母校，祝母校越办越好！